

清代學術
名著叢刊

〔清〕顧炎武 著
樂保羣 呂宗力

黃汝成 集釋
校點

日知錄集釋

全校本

上

日知錄集釋卷一

崑山顧炎武著

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

三易

夫子言包義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
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
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而周官大卜
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
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
雷氏曰伏義
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
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於西北陰
動而退右轉而位於西南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
南北而四時春帝出乎震之象以正又以乾元用九清

夫子言包義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
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
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而周官大卜
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
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
雷氏曰伏義
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
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於西北陰
動而退右轉而位於西南于是震兌正于東西坎離正于
南北而四時春帝出乎震之象以正又以乾元用九清
之所以為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歸藏者黃帝
易也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代學術
名著叢刊

〔清〕顧炎武 著 黃汝成 集釋
樂保羣 呂宗力 校點

日知錄集釋

全校本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日知錄集釋:全校本 / (清)顧炎武著;黃汝成集釋;
栾保群,呂宗力校點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06. 12

(清代學術名著叢刊)

ISBN 7-5325-4459-1

I. 日... II. ①顧... ②黃... ③栾... ④呂...

III. ①日知錄-注釋②文史哲-研究-中國-清代

IV. B249. 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6)第 072125 號

清代學術名著叢刊

日知錄集釋(全校本)

(全三冊)

[清]顧炎武 著 黃汝成 集釋

栾保群 呂宗力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66.375 插頁 15 字數 1,200,000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2,300

ISBN 7-5325-4459-1

K·880 定價: 180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從《日知錄》到《日知錄集釋》（代前言）

陳祖武

《日知錄》是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顧炎武的代表作品，也是十七世紀中葉我國知識界一部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巨著。這部書不僅在當時激起強烈共鳴，而且影響所及綿亘有清一代。乾嘉間樸學發皇，治《日知錄》幾成專學。道光初，黃汝成集諸家研究之大成，纂為《日知錄集釋》，為《日知錄》研究做了一個承上啓下的總結。從《日知錄》到《日知錄集釋》，不啻百餘年間學術演進的一個縮影，留下了甚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。

一、為學與為人相統一的一生

《日知錄》的著者顧炎武，原名絳，字忠清，明亡，改名炎武，字寧人，號亭林，江蘇昆山人。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），享年七十歲。炎武一生將為學與為人合為一體，操志高潔，學博識精，成為開啓一代學術先路的傑出大師。

顧氏為江東望族，炎武高曾祖輩世為明廷仁宦，至其父輩，家道中落。時值明末，朱氏王朝經濟崩潰，政治腐朽，猶如癰疽積年，只待潰爛。社會的危機，家境的窘迫，逐漸孕發炎武為學以救世的思想。

自明崇禎十二年（一六三九）起，炎武「感四國之多虞，耻經生之寡術」^①，本「士當求實學」^②的家訓，斷然掙脫科舉制度的束縛，傾全力於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和《肇域志》的纂輯。從此，專意搜集有關農田、水利、礦產、交通及地理沿革諸方面的材料，試圖據以探尋國貧民弱的根源所在，揭開了一生為學的新篇章。

崇禎十七年四月，明亡消息傳到江南。五月，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，炎武獲授兵部司務之職。為應弘光政權徵召，炎武撰成著名的「乙酉四論」，即《軍制論》、《形勢論》、《田功論》、《錢法論》。從劃江立國的實際出發，針對農田、錢法、軍制諸方面的積弊，炎武提出了若干解救危難的應急措施。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五月，炎武取道鎮江，前往南京赴任。未及到職，弘光政權已告覆滅。目睹清軍的野蠻屠戮，炎武在蘇州從軍抗清。兵敗，昆山、常熟相繼失守，炎武嗣母絕食身亡，二弟死於非命，生母雖幸免一死，但已成終生殘疾。

山河破碎，家難頻仍。顧炎武寄心事於筆端，寫下了許多飽含愛國激情的詩篇。他以銜木填海的精衛自況，發出了「我願平東海，身沉心不改」^③的吶喊。此後五年間，炎武蓄髮明志，一直潛踪息影，輾轉於太湖沿岸，與各地抗清志士秘密往來。後為豪紳葉方恒加害，於順治七年被迫剃髮。十二年，再落葉氏圈套，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而入獄。出獄後，炎武決意遠離故土，到久已眷念的中原

①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六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序》。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餘集》不分卷，《三朝紀事闕文序》。
③ 顧炎武：《亭林詩集》卷一，《精衛》。

大地去。

順治十四年秋，炎武將家產盡行變賣，隻身北去，時年四十五歲。北遊之初，炎武頻繁往來於山東、河北，一度南還江浙。順治十八年，鄭成功率率部退往臺灣，僻處西南一隅的南明永曆政權滅亡。眼看復明大勢已去，炎武斷然拔足西走，決心「篤志經史」^①，把自己的後半生貢獻給著述事業。

自康熙元年（一六六二）起，顧炎武把遊踪擴至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。這以後，炎武除陸續撰寫大量的詩文雜著外，全部精力幾乎都用於《日知錄》的寫作。康熙二年，莊廷鑑私撰《明史》案發，炎武摯友潘耒、吳炎蒙難。噩耗傳來，炎武萬分悲痛，於山西汾州旅邸遙為祭奠，以歌當哭，高唱：「一代文章亡左馬，千秋仁義在吳潘。」^②同時，還以《書吳潘二子事》為題，撰文詳記二友死難始末，以表彰二人節操。炎武因憎惡明末的講學風氣，終身不登講壇，不納弟子。但為表示對潘耒的紀念，破例將潘耒收為弟子。

康熙五年，山東萊州「逆詩」案發。七年二月，炎武因之在濟南入獄。後幸有在翰林院供職的外甥徐元文斡旋，又得友人李因篤等竭力營救，始於同年十月取保出獄。萊州詩獄了結後，炎武一如既往，以友人所贈二馬二騾裝馱書卷，攀山越嶺，不辭辛勞，為著述事業而進行大量的、艱苦細緻的實地考察。

晚年的顧炎武，行萬里路，讀萬卷書，以其湛湛的學術造詣而名著朝野。然而不與清廷合作的志

①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，《與人書二十五》。
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詩集》卷四，《汾州祭吳炎潘耒章二節士》。

顧，則堅如磐石，朝廷顯宦幾度禮聘，皆為炎武斷然拒絕。康熙十年，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邀炎武預修《明史》，炎武正言相告：「果有此舉，不為介推之逃，則為屈原之死。」^①十七年，清廷詔舉博學鴻儒，內外大吏皆欲以炎武列名薦牘。炎武鄭重聲明：「人人可出，而炎武必不可出。」宣告：「七十老翁何所求？正欠一死！若必相逼，則以身殉之矣。」^②為表示決心，炎武選定陝西華陰為終身客居地，從此不再進入北京。

康熙二十年八月，顧炎武旅居山西曲沃，不幸染疾。翌年正月初八日，溘然長逝。

顧炎武一生，「身涉萬里，名滿天下」^③，以「行奇學博，負海內重望」^④。他廣泛涉足於經學、史學、方志、輿地、音韻文字、金石考古以及詩文等學，在衆多學術領域，皆有卓越建樹。炎武著述繁富，「卷帙之積，幾於等身」^⑤。今可考見者，尚近五十種之多。《日知錄》三十二卷，為其代表著述，一生為學所得，大都薈萃其中，實為開一代學術風氣之力作。《音學五書》三十八卷，為炎武的另一部代表作品。清代二百六十餘年間，音韻文字學之能勃然歛起，由經學的附庸而蔚為大國，炎武建有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。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和《肇域志》，雖為炎武早年所輯，且僅係長編，尚須過細整理，然而對考

① 顧炎武：《蔣山傭殘稿》卷二，《記與孝感熊先生語》。
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，《與葉初菴書》。

③ 歸莊：《歸莊集》卷五，《與顧寧人書》。

④ 鈕琇：《觚賸》卷六，《蔣山傭》。

⑤ 王弘撰：《山志》卷三，《顧亭林》。

論中國古代史，尤其是有明一代的經濟史、社會史，以及方志、輿地諸學，皆極具價值。其他詩文雜著，諸如《顧亭林詩文集》、《明季實錄》、《歷代帝王宅京記》、《營平二州史事》、《金石文字記》、《左傳杜解補正》，以及《菰中隨筆》等，探討學術，知人論世，在在皆可採擇。

二、《日知錄》纂修考

顧炎武何時開始結撰《日知錄》？這是一個迄今尚無定論的問題。康熙九年，當該書以初成八卷在江蘇淮安付刻時，炎武曾在卷首寫有如下識語：「愚自少讀書，有所得輒記之，其有不合，時復改定。或古人先我而有者，則遂削之。積三十餘年，乃成一編。」^①由康熙九 years 上溯三十餘年，約當明崇禎十二年。早先談《日知錄》，我曾據此將其始撰時間大致定在明末。一九九八年初，河北人民出版社約撰《曠世大儒顧炎武》，經與幾位年輕學友切磋，認為僅據這篇題記來判定《日知錄》的始撰時間，恐怕還缺乏足夠說服力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這裏有一個認識問題需要解決，即能否把顧炎武早年讀書做札記，同結撰《日知錄》看成一回事。我們認為，應當把二者區別開來。的確，從少年時代開始，顧炎武就接受了讀書要做札記的良好教育，用炎武的話來講，就叫做「鈔書」。炎武晚年寫過一篇《鈔書自序》，文中說：「先祖曰：『著

① 顧炎武：《日知錄》卷首，《題記》。

書不如鈔書。凡今人之學，必不及古人也，今人所見之書之博，必不及古人也。小子勉之，惟讀書而已。」至於何時開始作讀書札記，這篇《鈔書自序》也有回顧：「自少為帖括之學者二十年，已而學為詩古文，以其間纂記故事。年至四十，斐然欲有所作。又十餘年，讀書日以益多，而後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。」^①可見，炎武雖自幼聞「鈔書」庭訓，而付諸實踐去「纂記故事」，已經二十餘歲，直至四十歲才開始著書，五十餘歲以後，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。炎武二十餘歲當明崇禎中，而四十歲則已入清，為順治九年，五十餘歲就是康熙初葉了。

其次，顧炎武自崇禎十二年開始纂輯的書並非《日知錄》，而是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和《肇域志》。據炎武晚年所撰《天下郡國利病書序》稱：「崇禎己卯，秋闈被擯，退而讀書。感四國之多虞，耻經生之寡術，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、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，有得即錄，共成四十餘帙。一為輿地之記，一為利病之書。」^②崇禎己卯即十二年，炎武時年二十七歲。關於這方面的情况，《肇域志序》也說得很清楚：「此書自崇禎己卯起，先取《一統志》，後取各省府州縣志，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。」^③可見，顧炎武《鈔書自序》中所說的「纂記故事」，即指崇禎十二年、二十七歲起所輯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和《肇域志》。

再次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、《肇域志》卷帙浩繁，顧炎武在完成這兩部書稿之前，不可能再分心去

①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二，《鈔書自序》。
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六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序》。

③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六，《肇域志序》。

結撰《日知錄》。據考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初稿完成，當在順治九年。是時，由於豪紳煎迫，家難打擊，炎武已萌棄家北遊之想。為此，江南友人楊彝、萬壽祺等，於是年初聯名寫了一篇《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》^①。文中明言，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已「手錄數十帙」，之後，炎武將「遊覽天下山川風土，以質諸當世之大人先生」^②。至於《肇域志》的脫稿，則在此後十年，即康熙元年。是年十月，炎武撰《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後》有云：「右十年前友人所贈。自此絕江逾淮，……往來曲折二三萬里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，爰成《肇域記》。」^③

最後，炎武本人及友朋談及《日知錄》，皆在康熙初年以後。今本《日知錄》卷首所載炎武各條文字，如《初刻日知錄自序》、《與人書十》、《與人書二十五》、《與潘次耕書》、《與楊雪臣書》、《與友人論門人書》等，衆所周知，恕不引述。此外可以為證者，至少尚有如下五例：第一為康熙九年山東德州程先貞撰《贈顧徵君亭林序》，第二為康熙十一年炎武《與李良年書》，第三為康熙十二年炎武《又答李武曾書》，第四為康熙十二年炎武《又與顏修來書》，第五為康熙十五年炎武《與黃太冲書》。文繁，有我不錄。

根據以上所考，足見把《日知錄》的始撰時間定在明崇禎十二年似欠妥當。我們以為，宜以顧炎武逝世前夕，康熙二十年《與人書》為據。炎武在此信中說：「某自五十以後，篤志經史，其於音學深有所

① 蘇州大學周可真教授著《顧炎武年譜》考之甚詳，請參閱。

② 沈岱瞻：《同志贈言》之《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》。

③ 顧炎武：《亭林佚文輯補》不分卷，《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徵天下書籍啓後》。

得。今為《五書》以續《三百篇》以來久絕之傳，而別著《日知錄》，上篇經術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聞，共三十餘卷。有王者起，將以見諸行事，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，而未敢為今人道也。」^①據此，《日知錄》的始撰時間，假如定在康熙元年，即炎武五十歲以後，或許會更合理一些。

在《日知錄》的結撰過程中，初刻八卷本的問世，是一個重要環節。以往，由於這個本子流傳未廣，不易得讀，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誤認為已經亡佚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這個本子影印，附錄於《日知錄集釋》出版，這樣不僅澄清了誤會，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。

《日知錄》的初刻時間，可以大致確定為康熙九年八月。根據主要是兩條，第一條為顧炎武康熙十五年所撰《初刻日知錄自序》。序中說：「炎武所著《日知錄》，因友人多欲鈔寫，患不能給，遂於上章闡茂之歲刻此八卷。」^②上章闡茂為干支紀年之庚戌，即康熙九年。第二條為前述程先貞撰《贈顧徵君亭林序》，該序所署年月即為康熙九年八月。有關《日知錄》初刻時間的資料，還見於《蔣山傭殘稿》。其中，炎武的《與友人書》說：「《日知錄》初本乃辛亥年刻。」^③辛亥年為康熙十年。顧炎武談《日知錄》初刻，為什麼在時間上會出現庚戌、辛亥二說？我們以為，是否可以做這樣的理解，即八卷本《日知錄》係康熙九年始刻，而至康熙十年完成。

初刻八卷本問世之後，《日知錄》的結撰不間寒暑，精益求精，耗盡了顧炎武畢生的心力。對於其

①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，《與人書二十五》。
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二，《初刻日知錄自序》。

③ 顧炎武：《蔣山傭殘稿》卷一，《與友人書》。

間的甘苦，炎武曾經說：「嘗謂今人纂輯之書，正如今人之鑄錢。古人采銅於山，今人則買舊錢，名之曰廢銅，以充鑄而已。所鑄之錢既已粗惡，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判碎散，不存於後，豈不兩失之乎？承問《日知錄》又成幾卷，蓋期之以廢銅。而某自別來一載，早夜誦讀，反復尋究，僅得十餘條，然庶幾采山之銅也。」^①顧炎武將《日知錄》的結撰喻為采銅於山，可見其勞作的艱辛和學風的嚴謹。

晚年的顧炎武，恪遵「良工不示人以璞」的古訓，精心雕琢《日知錄》。在致弟子潘耒的信中，炎武說：「著述之家，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。昔伊川先生不出《易傳》，謂是身後之書。……今世之人速於成書，躁於求名，斯道也將亡矣。前介眉札來索此（指《音學五書》——引者），原一亦索此書，並欲鈔《日知錄》。我報以《詩》、《易》二書今夏可印，其全書再待一年，《日知錄》再待十年。如不及年，則以臨終絕筆為定。」^②顧炎武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，迄於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逝世，他始終未曾把已經完成的三十餘卷《日知錄》再度付刻。直到十三年之後，遺稿始由潘耒刪削整理，在福建建陽刻印。

三、《日知錄集釋》的纂輯

清代道光間問世的《日知錄集釋》，是研究清初學者顧炎武所著《日知錄》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。

①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，《與人書十》。

② 顧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四，《與潘次耕書》。

然而關於該書的纂輯故實，却少見系統深入的梳理。

《日知錄》以其樸實無華的務實為學，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，開啓了一代健實的新學風。因此，該書問世之後，在學術界迅速激起反響，一時南北學者，競相作同調之鳴。但是自康熙中葉以後，隨着清廷統治的趨於穩定，尤其是雍正、乾隆兩朝文字獄的冤濫酷烈，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所寄寓的學以經世思想，橫遭閹割。為之後學術界所繼承的，只是其樸實的考經證史方法而已。於是瑣細的考證補苴，日漸成為《日知錄》研究中的主流。此風自閻若璩開其端，中經李光地等朝中顯貴張大其勢而深入廟堂，到乾隆、嘉慶兩朝達於極盛。百餘年間，注者蜂起，至九十餘家之多。其中，既有經學大家如惠棟、江永、顧棟高、戴震、莊存與，也有史學大家如全祖望、錢大昕、王鳴盛、趙翼、邵晉涵，還有一時文壇盟主方苞、姚鼐等。風起雲涌，久傳不衰，儼若專門學問。

嘉慶、道光之際，清王朝越過其鼎盛時期而步入衰世。綿延於川、楚、陝邊區的白蓮教大起義，直逼宮禁的北方天理教起義，西方殖民者以武力為後盾的鴉片貿易，凡此種種，內外交困，有力地撼着清王朝的統治大廈。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大動蕩時期已經來臨。當此多事之秋，知識界反映最稱敏感。面對深刻的社會危機，乾嘉以來風靡朝野的考據學，伴隨其所附著的社會亦盛極而衰。以莊存與、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今文經學派，闡發《春秋》公羊學大義，倡變法以圖強。道光五年（一八二五），著名思想家魏源沿波而起，輯《清經世文編》成。以之為標志，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、顏元等清初學術大師學以經世的傳統，又為時代召喚到歷史舞臺。總結百餘年來《日知錄》的研究成果，恢復其淹沒已久的經世思想，已成為一個時代的課題。而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人，既非一時朝廷顯貴，亦非學

術界名流，却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人黃汝成。

黃汝成，字庸玉，號潛夫，江蘇嘉定（今屬上海）人。生於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，卒於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。汝成生在考據大師錢大昕故里，其嗣父鐘即為大昕弟子，生父鉉亦以善詩文而名著一方。汝成少承家學，又兄事大昕再傳弟子毛岳生，頗得鄉里前輩為學端緒。自十三四歲起，即已「熟習文史」^①，二十歲以後，成為縣學廩膳生。後因久困場屋，不得入仕，遂致力經史，博及天文曆法、田賦河漕、職官選舉、鹽務錢法等。汝成所最為服膺者，則是顧炎武的《日知錄》。正如他在寫給當時江南著名學者李兆洛的信中所述：「自少至今，尤好顧氏《日知錄》一書。」^②

《日知錄》之所以令黃汝成傾倒，並不在於文辭的博辯，考據的精詳。在汝成看來，乃是因為「其書於經術文史、淵忽治微，以及兵刑、賦稅、田畝、職官、選舉、錢幣、鹽鐵、權量、河渠、漕運，與他事物繁曠者，皆具體要」^③，是一部「資治之書」^④。因此，在毛岳生的輔導之下，汝成持之以恆，長期致力於《日知錄》的董理。他以閻若璩、沈彤、楊寧、錢大昕四家校本為主要依據，博采諸家疏解，對康熙三十四年（一六九五）潘耒刻本逐卷校釋，終成《日知錄集釋》三十二卷，於道光十四年五月刊行。書成之後，汝成又覓得《日知錄》原寫本，經與潘刻本詳加比勘，辨其異同，正其疑似，共得七百餘條，成《日知錄刊

① 毛岳生：《休復居文集》卷五，《黃潛夫墓志銘》。

② 黃汝成：《袖海樓文錄》卷三，《答李先生申書書》。

③ 同②。

④ 黃汝成：《袖海樓文錄》卷二，《日知錄集釋序》。

誤》二卷，於道光十五年二月刊行。之後，汝成再得嘉興陸筠精校本，取與先前所纂《集釋》校訂，成《日知錄續刊誤》二卷，於道光十六年九月刊行。

黃汝成家素富厚，不惟刻書費用概由己出，而且還捐資選授安徽泗州訓導。但因其生母、嗣父相繼去世，故而居喪在家，未能赴任。汝成秉性曠達，樂於周濟友朋困乏，深得遠近學者敬重。無奈身體過於肥胖，長期為哮喘所苦，後竟因之而遽然去世，卒年僅得三十九歲。黃汝成正當有為之年而被病魔奪去生命，使他的衆多生前友好至為悲慟，毛岳生、李兆洛、蔣彤、葛其仁等，紛紛撰文吊唁。其生父哀汝成賁志而歿，遂委托毛岳生主持，對其遺文雜著加以搜集整理，題名《袖海樓雜著》，於道光十八年九月結集刊行。其中包括《袖海樓文錄》六卷，《古今歲實考校補》一卷，《古今朔實考校補》一卷，《日知錄刊誤合刻》四卷。汝成生前，在完成《日知錄集釋》并《刊誤》之後，原擬續纂《春秋外傳正義》，終因猝然病歿而成未竟之業，僅於《文錄》中留下數篇札記而已。

黃汝成輯《日知錄集釋》，以及相繼完成的《日知錄刊誤》、《續刊誤》，薈萃前人的研究所得，既闡發了原書精義，校訂了著者疏失，也糾正了潘刻本的若干舛錯。同時，還一掃乾嘉考據學家的偏頗，重申了炎武經世致用的撰述宗旨，從而為《日知錄》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為完善的本子。對汝成的艱苦勞作，理當充分肯定，值得紀念。然而到清末，非難聲起，竟指《日知錄集釋》為李兆洛纂輯，誣汝成竊竊書為己有。事實果真如此否？不然。只要我們稍事搜尋，比勘史料，即可驗證其間的真相。

首先，在李兆洛的現存遺著中，尋找不出任何足以說明他纂輯《日知錄集釋》的證據。固然，李兆洛一生正是以表彰先賢遺集，致力纂輯而著稱。因此，凡由兆洛纂輯，或經他表彰刊行的前哲著述，諸如

《皇朝文典》、《駢體文鈔》及《鄒道鄉集》、《瞿忠宣集》、《繹志》、《易論》等等，皆撰有序跋、題記一類文字。然而，唯獨就不見表彰《日知錄》的記載。尤其不應忽視者，在一部二十六卷的《養一齋文集》及《續編》中，竟然沒有一篇專門探討顧炎武學行及《日知錄》的文字。僅在《文集》卷四《顧君（廣圻）墓志銘》中，偶一提及「亭林先生羅列改書之弊」寥寥數字而已。這樣一種情況，恐怕同《日知錄集釋》纂輯者的地位是不相稱的。此外，兆洛高弟子薛子衡所撰《養一李先生行狀》，文中所羅列李氏纂輯書目，也無《日知錄集釋》。相反，李兆洛談及《日知錄集釋》，則準確無誤地稱其纂輯者為黃汝成。他說：「潛夫……所著書，惟成《日知錄集釋》三十二卷，《刊誤》二卷，《袖海樓文稿》若干首。」^①

其次，在李、黃二人的友朋中，凡談及《日知錄集釋》，皆衆口一詞，肯定其纂輯者為黃汝成。毛岳生是李、黃知交，岳生所撰《黃潛夫墓志銘》有云：「潛夫著書，成者《日知錄集釋》、《刊誤》、《古今歲朔實考校補》、《文錄》，凡四十四卷。未成者，《春秋外傳正義》若干卷。」^②宋景昌為李兆洛高足，汝成遺稿《古今歲朔實考校補》即經景昌校訂刊行。宋氏《歲朔實考校補跋》同樣說：「潛夫篤志好古，博學明識如此。始潛夫既成《日知錄集釋》與此書，復欲撰《春秋外傳正義》，未卒業遂歿。」^③兆洛之另一高足蔣彤，為《袖海樓文集》撰序，亦說得十分清楚：「寶山毛先生數數為予言黃君潛夫之為人。……迨後，得觀其所著顧氏《日知錄集釋》，嘆其志古人之學而能先其大者。繼得其《日知錄刊誤》及《續刊

① 李兆洛：《養一齋續集》卷五，《黃潛夫家傳》。

② 毛岳生：《休復居文集》卷五，《黃潛夫墓志銘》。

③ 宋景昌：《歲朔實考校補跋》，載黃汝成《袖海樓雜著》附錄。

誤》，尤服其大而能精，非徒閱博炫富而漫無黑白者。」^①

再次，作為《日知錄集釋》的纂輯者，黃汝成於《袖海樓文錄》中，不僅再三重申對該書的纂輯地位，而且多載與友朋討論《日知錄》及顧炎武學行的文字，諸如《與吳淳伯書》、《答李先生申耆書》、《與毛生翁書》等。正是在與李兆洛的書札往復中，保存了兆洛對《日知錄集釋》的傾心推許：「評騭考核，刪削繁類，使此書得成鉅觀，有益世道人心，真學者之幸也。」^②黃汝成學風篤實，凡四方友朋在《集釋》成書過程中所給予的幫助，諸如親朋故舊的提供皮藏資料，李兆洛、吳育、毛岳生對書稿的審訂，毛岳生對《刊誤》、《續刊誤》的校核，同邑友好王浩自始至終的「勤佐探索」^③等等，感銘不忘，屢見表彰。所有這些記載，確然有本，可信可據，顯然非剽竊作偽者之所能為。

綜上所考，足見《日知錄集釋》的纂輯者本來就是黃汝成，並不是李兆洛。李兆洛於《集釋》，確有「校讎之勞」^④，而無纂輯之功，這才是歷史的真相。

近者，欣悉樂保羣、呂宗力二位學弟早年之《日知錄集釋》點校稿，經精心審訂，歷有年所，行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謹刪削舊文以附驥尾，既志祝賀，亦敬請諸位先進賜教。

① 蔣彤：《丹稜文鈔》卷二，《袖海樓文集序》。

② 黃汝成：《袖海樓文錄》卷三，《答李先生申耆書》。

③ 黃汝成：《袖海樓文錄》卷二，《日知錄刊誤序》。

④ 蔣彤：《丹稜文鈔》卷三，《養一子述》。